

# 侨易学理论之内涵与启发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 首都国际文学研究基地, 北京 100732)

〔关键词〕 侨易; 侨易学; 内涵; 启发

〔摘 要〕 叶隽在李石曾“侨学”的基础上引入《易经》的智慧创建了侨易学理论, 其哲理思维模式为“二元三维”, 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等, 其主要研究对象为由于物质位移而导致精神质变的侨易现象。该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建构性、整合性、超越性等特点; 同时, 在研究对象、理论命题以及学科特殊性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与论证。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6)04-0060-04

叶隽所提出来的侨易学理论, 以其视野宏阔的“‘大设计’精神”<sup>[1]</sup>而广受学界关注, 已有不少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解读和评析, 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回到《创变与渐常: 侨易学的观念》一书本身, 对侨易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做一简单解读, 并就其启发性意义略陈管见。

## 一、“侨”与“易”的含义

李石曾早年曾提出“侨学”的概念, 他指出: “侨学为研究迁移、升高、进步的学问”, “侨学是一种科学, 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 从此一地到彼一地, 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 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sup>[2]</sup>。由此可见, 李石曾的“侨学”研究对象为与“侨”即“移动”相关的现象, 它包含移民现象而限于移民现象。叶隽在李石曾“侨学”概念的启发之下, 引入《易经》的智慧, 创造性地提出了“侨易学”概念。

叶隽“侨易学”概念之创见在于“易”, 理解侨易学之关键亦在于“易”。

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对《易经》之“易”的解释, 郑玄之说比较有代表性: “易一名而含三义: 易简一也, 变易二也, 不易三也。”<sup>[3]</sup>按郑玄的说法, “易”的含义包括简易、变易、不易三种。任继愈先生认为, 《易经》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 观物

取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sup>[4]</sup>。叶隽由任先生的“万物交感”而引申出“易”之“交易”之义, 从而赋予“侨易”之“易”以四义: “乃易有三进, 一为变易, 二为交易, 三为简易; 道乃不易, 大道不易。”<sup>[5]</sup>这样, 就在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变易、不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义”——“交易”。

具体说, “变易”指事物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过程; “简易”指大道至简, 复杂的过程最后可以言简意赅甚至以公理、定义的形式表现; “不易”指千变万化的事物最终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性规律; 而“交易”则是事物变易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 “是因较大异质性的环境(context)变化而导致的事物的质性变化, 所谓侨易, 实际上更多体现为交易的内容。因为有二元关系的相交, 所以有侨易现象的产生”(第5—6页)。也就是说, “交易”是指事物“变易”过程中由于异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易”——事物的质性变化, 亦即在侨动过程中, 正是“相交”、“交感”带来了“易”。所以, “交易”是侨易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自然也是“侨易学”最关注的对象, 叶隽明确指出: “我们提出‘侨易学’的概念, 虽然也兼顾变易、简易的研究, 但其核心部分则主要放在‘交易’层面。”(第6页)

要之, “侨易学”之“侨”指侨动、移动; “侨易学”之“易”源自《易经》之“易”, 含变易、交易、简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6YJ010016)。

〔作者简介〕段江丽, 女, 湖南洞口人,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学研究基地教授, 文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易、不易等四层含义,“四易”之中尤重交易,亦即侨易学主要关注的是侨易主体如何通过“相交”而因“侨”致“易”、产生质性变易的过程。从质性变易这一点来说,叶隽的侨易学理论与曹顺庆先生所提出来的跨文明研究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sup>[6]</sup>。

至于侨易主体,如果以“人”为关注点,包括侨易个体、侨易群体以及侨易共同体。侨易个体之典型如晏阳初因为留美时代到欧洲参与华工服务而发生思想质变,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华工教育思想并进而发展出“平民教育”事业,这里的侨易主体是晏阳初。侨易群体之典型如郭沫若、王光祈、魏时珍、李劫人、周太玄等人曾经都是四川省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属中学的学生,甚至有好几位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在人生征程中都发生了明显的侨易现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他们的精神质变过程中除了个体性因素之外,还具有某种共同的作用于群体性对象的力量,所以,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侨易群体。侨易群体的子集进一步扩大,还可以构成侨易共同体,其典型如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分子、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欧洲知识分子等<sup>[7]</sup>。

## 二、侨易学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对象

叶隽说侨易学的“基本思维在于‘二元三维,大道侨易’,即‘乾元—坤贞’构成基本的二元结构,而其内部又形成三维结构,其外则是大道笼罩,而内部的流力因素,则是寻求如何搭建两者之间的桥梁,并进而形成有效的‘第三者’立足点的可能;而侨易规律本身也不妨视为一种流力因素”(第16页)。这里的“二元”分别指“易经”之乾、坤二卦,“三维”之“三”则是指“‘乾坤二卦’本身之外处于二者之间的‘流力因素’”(第14页),亦“即太极图中处于阴阳之间的交互部分”。(第122页)至于“大道”之“道”,即老子“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34章》)、“道生一”(《老子》第42章)之“道”,亦即天地之间之大道,“大道侨易”应该是指“大道”体现在由“侨”致“易”的过程之中。这样,在叶隽的侨易学理论体系中,乾坤二卦以及二者之间的流力因素就构成了“二元三维”的哲理层面的思维模式。

“二元三维”的哲理思维模式落实到实证性研究中,具体研究方法表现为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

所谓观侨阐理,“乃是就最基本的侨动过程,给出一个原则性阐释,推究其侨动过程的原因”(第32页)。亦即观侨阐理就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对侨动现象作出解释说明。

所谓取象说易,是指对侨动现象进行选择,确定具有学术意义的侨易现象。广义上一个普通农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走亲戚或赶集、猴子爬山、航天飞船进行航天活动等等,都可视为“侨动”,不过,作为侨易学研究对象的侨动现象,强调“在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差结构之间发生的侨动过程”(第32页)。换句话说,“取象”就是要对侨动现象进行甄别选择,择取那些发生了质性变化的侨动现象作为侨易学研究的对象。

所谓察变寻异,是指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变化之中寻求相异性因素。察变寻异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事物变化的关键,先寻“异”,再存“异”,再美“异”,最后达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大同”之境。(第33页)

在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这三种研究方法中,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取象说易”。“取象”牵涉到侨易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如上所说,侨动现象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侨易现象指一切侨动现象;狭义的侨易现象指发生在“异质性的文化差结构之间”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侨动现象。比如说,上面所说的一个普通农人临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走亲戚或者赶集,以及毛泽东从湘潭来到长沙,虽然都发生了“位移”,广义上都属于侨动,但是,前者可能并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后者则为典型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侨易现象。“取象”的过程就是“择取‘侨易现象’,将之上升到一个质性的概念层面。”(第33页)具体来说,侨易现象的核心就在于“变”,一种物质位移现象是否可以成为侨易学理论视野中的侨易现象,关键看侨易主体是否因为物质位移而产生了精神质变。所以,叶隽强调:“侨易现象既非单纯的位移现象,也非纯粹的思想现象,而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结合。”(第91页)他还进一步强调,要在器物、制度、文化的宏观的三维结构中进行考察,以物质与精神(文化)为两端,以制度为沟通两端的桥梁。制度作为一个中介点,起到连接下端的物质层和上端的文化层的作用,这样,在物质现象(侨易过程本身)与精神现象(思想质变之后果)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维度——制序现象或者称为制度现象,这个中介点,正是考察侨易之“变”的关键。

### 三、侨易学理论的启发

“侨易学这个依赖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性理论”<sup>[8]</sup>无疑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与启发意义,这里主要谈三点。

第一,建构性。叶隽在论及《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的缘起时说,受到撒切尔夫人关于“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之质疑等因素的刺激,他和朋友们深感“吾国之兴起于世界,必当先有思想之原创,乃能别开天地而为中国文化开新景,为世界文明寻出路”<sup>[9]</sup>。理论建构之自觉与学术境界之高远于此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正如曾艳兵先生在《侨易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刚刚经历乃至仍在继续经历一个解构一切、消解一切、终结一切的时代,在此背景之下的“建构”无疑更需要识见与勇气。在世事纷繁、人心不古、价值崩溃、学风浮躁的当下,学人如何寻找、确认、坚守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提供具有建构性意义的原创思想,是每一位学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叶隽以他“想了五年,写了三年”<sup>[10]</sup>的侨易学理论给出了令人钦佩的回答。

第二,整合性。侨易学理论思维的基石是《易经》中的古老智慧,可是并非对《易经》做简单的当代阐释,而是将《易经》智慧中的“变”与“易”作为最根本的理论元素,揉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分为三”的智慧。如果说道家借鉴了《易经》的智慧,那么,侨易学理论基本思维模式之“二元三维”又进一步整合了《易经》二元互补与道家一分为三的智慧;再将“变”、“易”与现当代无所不在的“侨动”现象结合起来,探求主体由外在“侨动”所导致的内在精神质变,从而凸显并强调二元之间的“流力因素”的意义,即“三”的意义,强调“在大千世界的变动不居中把握大道所在”(第98页),在“变”中求“不变”,在“不变”中求“大道”——透过人类社会中不同文化、不同制度所导致的形形色色的事物的表象,探求其本质的、规律性的、共通性的实质,因此,“‘侨易学’是一门探讨文化迁徙、交流和变化的大学问”<sup>[11]</sup>,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亦具鲜明的“整合性”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因为侨易主体包括了“个体、群体、机构、国族、文化等”(第34页)各个方面,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范畴来说,侨易学涵盖了比较文学<sup>[12]</sup>、文化交涉学<sup>[13]</sup>、流散文学等诸多领域。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侨易学整

合了比较文学、文化交涉学、流散文学等学科概念,具有“超学科”<sup>[14]</sup>而非跨学科的性质,可以作为这些学科概念的一个上位概念来使用。叶隽曾指出,在理论思维和资源方面,对侨易学来说,“应该努力荟萃文学家的艺术与智慧(兼及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判断)、史学家的缜密与坚实、社会学家的概括和理论、人类学家的嗅觉和洞察,其余则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都作为相应手段,最后要达致的是哲学家的体系与高度”(第27页)。可见在操作方法的层面,侨易学亦具鲜明的整合性特点。

第三,超越性。如上述第二点所说,侨易学在研究范畴上具有“超学科”的超越性特征;同时,侨易学在研究目的与价值方面亦具超越性特征。侨易学理论认为,在“二元结构”及其内部形成的“三维结构”之外“是大道笼罩”(第16页),“是一种面对世界宇宙的精神”(第17页),所以,真正的学人不应该只是“一个‘现代学术’制度规训出来的工业化流程‘知识匠人’”,“更应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寻道者’身份”(第26页)。作为“寻道者”,研究的目的不是停留在“二元对立”的层面,而是关注存在于“二元对立”之外的“世界三”(第81页),关注“二元状态”的多种可能性: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彼此帮助的互助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和谐关系,即在考察“二元对峙”的状态时同时要考虑到个体独立与多边博弈的情形。在这种视野之下,“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已经是个庞大的人类系统,而自然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巨型存在,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地球、银河系、宇宙等更为巨硕的集体概念”(第76页)。这样,侨易学研究的意义也就超越了对任何单一“个体、群体、机构、国族、文化”的价值评判,而是“在于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第18页)。体现的是“以世界为胸怀,不分畛域,将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作为自身治学的客观对象”(第8页)的可谓恢弘的大格局,因此,其研究本身也就获得了形而上的超越性价值。

总之,叶隽先生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在“接续”中国传统元典智慧的同时,“创辟发明”了具有整合性与超越性意义的侨易学理论,在这个崇尚“解构”、理论原创力相对匮乏的时代,其理论创新的才具与胆识都弥足珍贵。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仍是发展中的理论”<sup>[15]</sup>,无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论证,这里提出三点:第一,从研究对象来说,除了以

“人”为中心的侨动现象之外,如何处理其他侨易现象?如何界定“侨易主体”?叶隽曾提出,侨易主体包括了“个体、群体、机构、国族、文化等”,但是,在对“侨易主体”进行讨论时,所涉及的三类“侨易个体”、“侨易群体”、“侨易共同体”均是就“人”而言;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关注的也主要是“人”的侨动现象,“机构、国族、文化”的侨动现象如何处理?主要针对“人”的侨动现象设计的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以“机构、国族、文化”为侨易主体

的侨动现象?第二,从理论命题来说,“大道侨易”、“三”、“道”等侨易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何更准确、清晰地界定?第三,从学科的特殊性来说,侨易学与比较文学、流散文学、文化交涉学等既有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当一种理论整合了所有其他相关理论之后,其具独特意义的本质特征如何体现?等等,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和阐释的空间。

### [参 考 文 献]

- [1][10][15]周宁:《〈创变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 [2]《侨学发凡》(1942),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296、332页。
- [3]郑玄:《易赞》《易论》,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篇》第1册第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 [5][7][9]叶隽:《创变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7—111、“总序”第1页。
- [6]曹顺庆:《跨文明论的异质性、变异性及他国化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8]乔国强:《“侨易”的内涵与外延》,《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期。
- [11][14]陈建华:《侨易的交易之道——读叶隽〈创变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书城》,2014年第12期。
- [12]关于侨易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可参看曾艳兵《侨易学与比较文学》一文。
- [13]关于文化交涉学,请参见《文化交涉学——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http://www.douban.com/note/244528848/ 2015-04-24

## Qiao-Yi Theory: Connotation and Revelation

DUAN Jiang-li

(The Capital International Culture Research Base,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words:** Qiao Yi; Qiao-Yi-ology; connotations; inspiration

**Abstract:** Mr. Ye Jun made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a theory named "Qiao-Yi" after Li Shizeng's Qiao-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wisdo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thinking model of Qiao-Yiology is summed up as "two elements and three dimensions". Its methodology includes "Interpretation in view of Qiao-Yi Phenomenon of focusing on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Its object of study is the phenomena of Qiao-Yi which refers to the mental changes caused by physical changes. This system is of constructive, integrative and transcending qualities. Good as it is, it still remains to be perfected in the scope of stud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the disciplinary particularities.

[责任编辑:江奎元]